

孙 机



中国圣火

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辽宁教育出版社

孙 机

中国圣火

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圣火 / 孙机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12
ISBN 7-5382-4653-3

I. 中… II. 孙… III. 文化交流 - 中外关系 - 研究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2945 号

中国圣火

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孙机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125 印数: 1-4,000 插图: 179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柳青松
责任校对: 张家璋 干郁文

封面设计: 张红
技术编辑: 郝德华

ISBN 7-5382-4653-3/K · 71

定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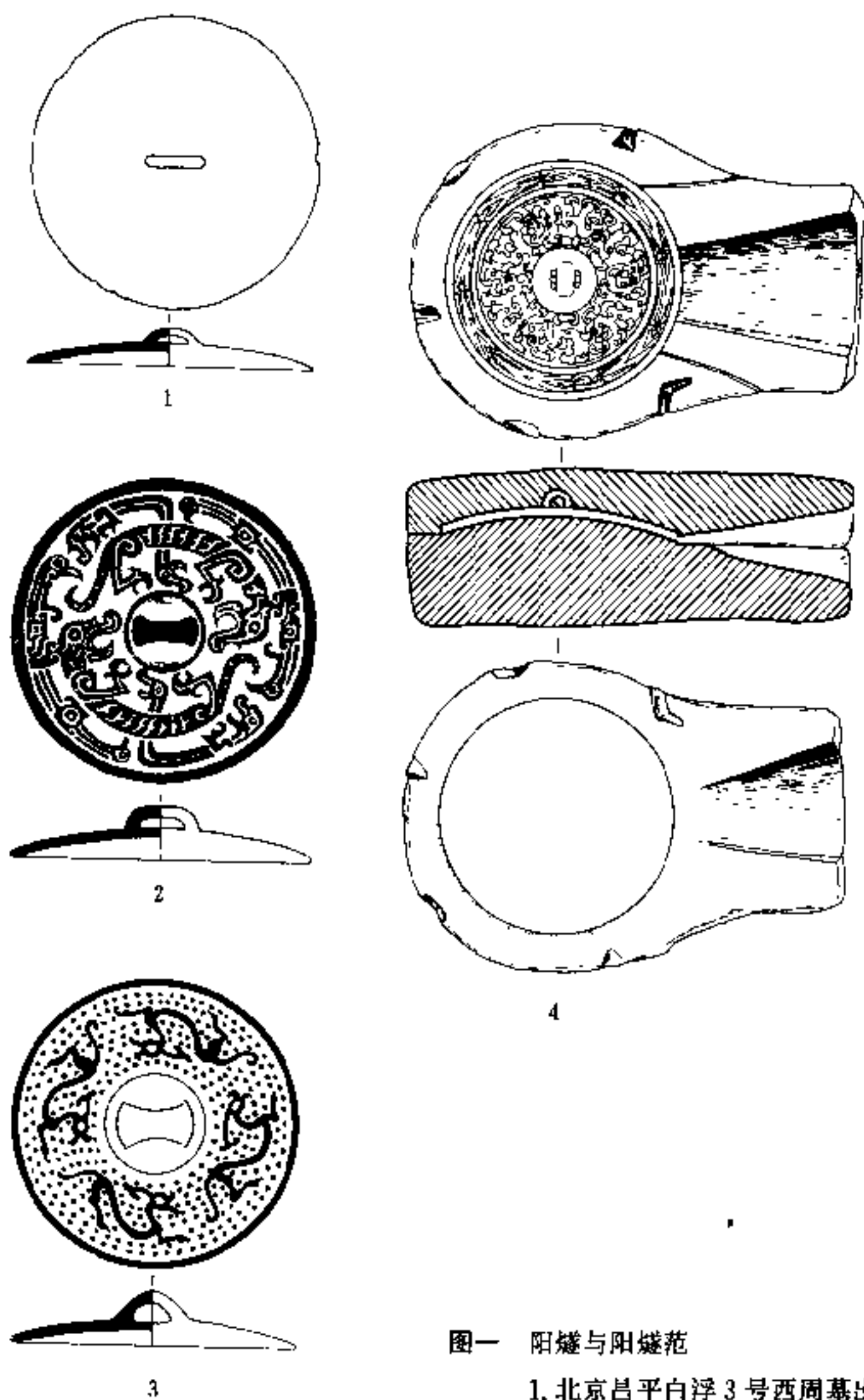
目 录

中国圣火	1
玉具剑与璜式佩剑法	15
百炼钢刀剑与相关之问题	44
东周、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	64
步摇·步摇冠·摇叶饰片	87
五兵佩	107
固原北魏漆棺画	122
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	139
七轮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	156
玛瑙兽首杯	178
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	198
唐俑中的昆仑和僧祇	251
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	260
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	278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295
后记	315

中国圣火

我国古代曾以阳燧将日光反射聚焦引燃艾绒而得火，因此此火“从天来”（《论衡·说日篇》），乃称为“明火”。《周礼·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烛，共明水。”郑玄注：“夫遂，阳遂也。鉴，镜属；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阴阳之精气也。明烛以照饌陈，明水以为玄酒。”可见明火和明水均用于祭祀，明火则用来点燃“明烛”，以照亮陈设的祭品。这种隆重的祭仪出现于先秦时，而为汉代所承袭。《汉旧仪》说：“皇帝唯八月饮酎。……以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为明水、火。”^①至唐代仍保留着这种作法。《旧唐书·礼仪志》载李敬贞议：“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比年祠祭，皆用阳燧取火。”应是当时实际情况的记录。而李氏指出阳燧形如圆镜，也和传统的说法相合。《淮南子·天文训》：“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高诱注：“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②淮南书另有许慎注，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三及《太平广记》卷一六一引作：“阳燧，五

石之铜精。圆以仰日，则得火。”在这里，许慎只说阳燧是圆形的铜器，魏晋时人乃以镜拟之。《太平御览》卷七一七引魏·高堂隆奏：“阳燧取火于日，……阴燧取水于月，并以铜作镜，名曰水火之镜。”晋·崔豹《古今注·杂注第七》也说：“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向日则火生，以艾承之，则得火也。”不过阳燧与普通的镜子也有区别，它是凹面的，而不像铜镜那样是平面或凸面的。《考工记·鳧氏》郑玄注：“隧在鼓中，窞而生光，有似夫隧。”此夫隧即司烜氏所掌之夫遂，即阳燧^③；其特点是“窞而生光”。高诱注把它比作杯状物，虽曲度有深浅之别，但用意大体相同。将阳燧之形制的特点概括得最全面的是唐·张戩的《考声切韵》，谓：“燧者，今之火镜也。圆径二寸许，皆有文，面窞。照日以艾承之，便得火。”^④出土的铜质阳燧正作凹面圆镜状。已知之最早的一批是西周时的。1975年在北京昌平白浮2、3号西周墓各出土一件，M 2:45号阳燧直径9.5厘米，M 3:30号阳燧直径9.9厘米^⑤（图一：1）。1995年在陕西扶风黄堆60号西周墓又出上一件，直径8.9厘米^⑥。以上三件均为素背。春秋时代的阳燧，于1957年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1052号虢国墓中出过一件，背面为双虎纹，直径7.5厘米^⑦（图一：2）。战国时代的，于1981年在浙江绍兴狮子山306号墓中出过一件，背面上下左右各饰一条龙纹，直径3.6厘米^⑧（图一：3）。1960—1961年，在山西侯马II号铸铜遗址之13号战国房址中还出过整套的阳燧范^⑨（图一：4）。至西汉时代，1983年在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出土素背阳燧两件，直径均为9.5厘米^⑩。此外还有若干传世品，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及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均有收藏。这些阳燧皆为圆形，正面均内凹，



图一 阳燧与阳燧范

1. 北京昌平白浮3号西周墓出土
2.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春秋虢国墓出土
3. 浙江绍兴狮子山306号战国墓出土
4. 陶范，山西侯马战国铸铜遗址出土

其中作过实测的，曲率半径为 22.12—7.26 厘米不等^①。它们的背面并不都铸有花纹，与张戩所称“皆有文”的说法不尽合。但从其凹面看，当时都能反射聚焦而引火，证明《司烺氏》的记载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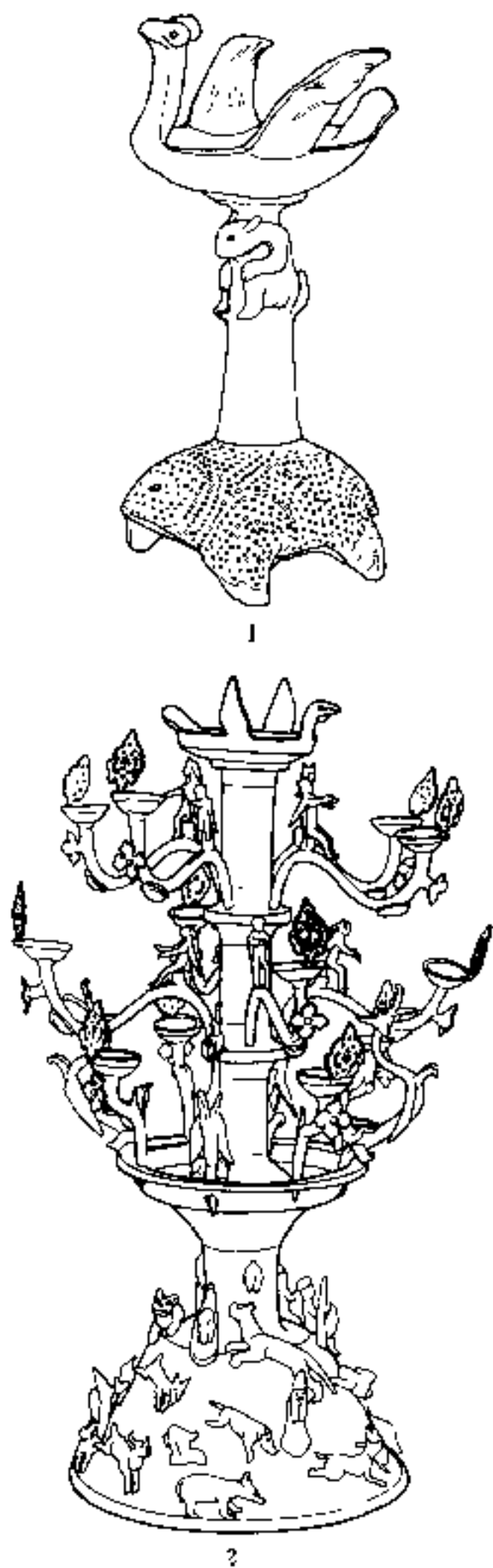
由于阳燧的这种功用，遂被认为具有与天相通的性质，从而阳遂一词也被赋予这样一层意思。《文选〔卷一七〕·洞箫赋》形容箫声：“被淋洒其靡靡兮，时横溃以阳遂。”张铎注：“忽如水流之纵横溃乱，复有清畅之音以通达也。”则阳遂亦训通达。北京市拣选到的一件汉代铜樽，铭文说：“郝氏之家大富贵，子孙千人皆阳遂。”^②也是祝愿其子孙获得通达尊显的地位之意。“富贵阳遂”作为吉语，在汉、三国时的铜器和砖瓦上曾一再出现^③。而如陕西绥德苏家岩东汉永元八年(96年)墓西门坎左下角阴刻的“阳遂”二字，却无疑应被理解作具有辟邪祈福的含义了^④。

为什么“阳遂”会有这一层含义呢？仅仅用“通达”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取明火于日”的阳燧既与天相通，自然会被看作是与太阳密切相关的神圣之物。近来发现，在祥瑞图画中，阳燧还有一个被神化了的形象，它竟和代表太阳的阳鸟类似，也



图二 朝鲜德兴里高句丽墓壁画中的阳燧之鸟与榜题

作禽鸟形。朝鲜平安南道大安市德兴里高句丽永乐十八年(408年)壁画墓前室墓顶东侧所绘神禽灵兽中有一大鸟，其旁之榜题为：“阳燧之鸟，履火而行”^⑮(图二)。这个形象的出现对认识“明烛”为何物很有启迪，拿它来印证1969年在河南济源泗涧沟24号新莽墓出土的一件陶灯，问题的解决就变得有门径可循了。此灯通高28厘米，基座为蟾蜍形，灯柱上部为兔形，灯盏为昂首振翅翘尾的鸟形(图三：1)。原发掘者李京华先生说：“这件灯和汉代画像石上的金乌含义有些相同，金乌象征太阳，中柱和灯座塑的兔和蟾蜍是象征月亮。日、月相合为‘明’。”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由于当时不知道鸟形也是阳燧的象征，所以只将它理解为“常明灯”^⑯。现在看来，其造型既寓意于“明”，鸟形灯盏又可代表阳燧，则此灯应即“明烛”之俦。稍后，于1972年在河南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又出土了一件十三支的大陶灯，通高85厘米。底部有膨大的斗笠形灯座，其上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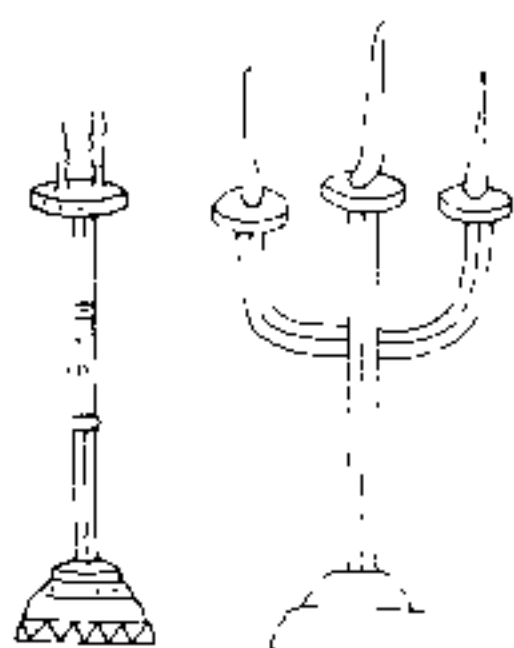
图三 汉代陶灯

1. 济源泗涧沟新莽墓出土
2. 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

塑各种动物和人物，应象征人寰。在灯座、灯柱之间的圆形灯盘上，以及上层与中层灯盏之曲枝的后部，都有端坐或乘龙的羽人，应象征仙界。灯柱顶端也有一枚大鸟形灯盏^{①7}（图三：2）。这只高踞仙凡之巅的鸟形灯，看来也只有从太阳取火的“明烛”可以当之。不过，由于它们的时代较晚，所以只能看作是《周礼》中提到的那类明烛的后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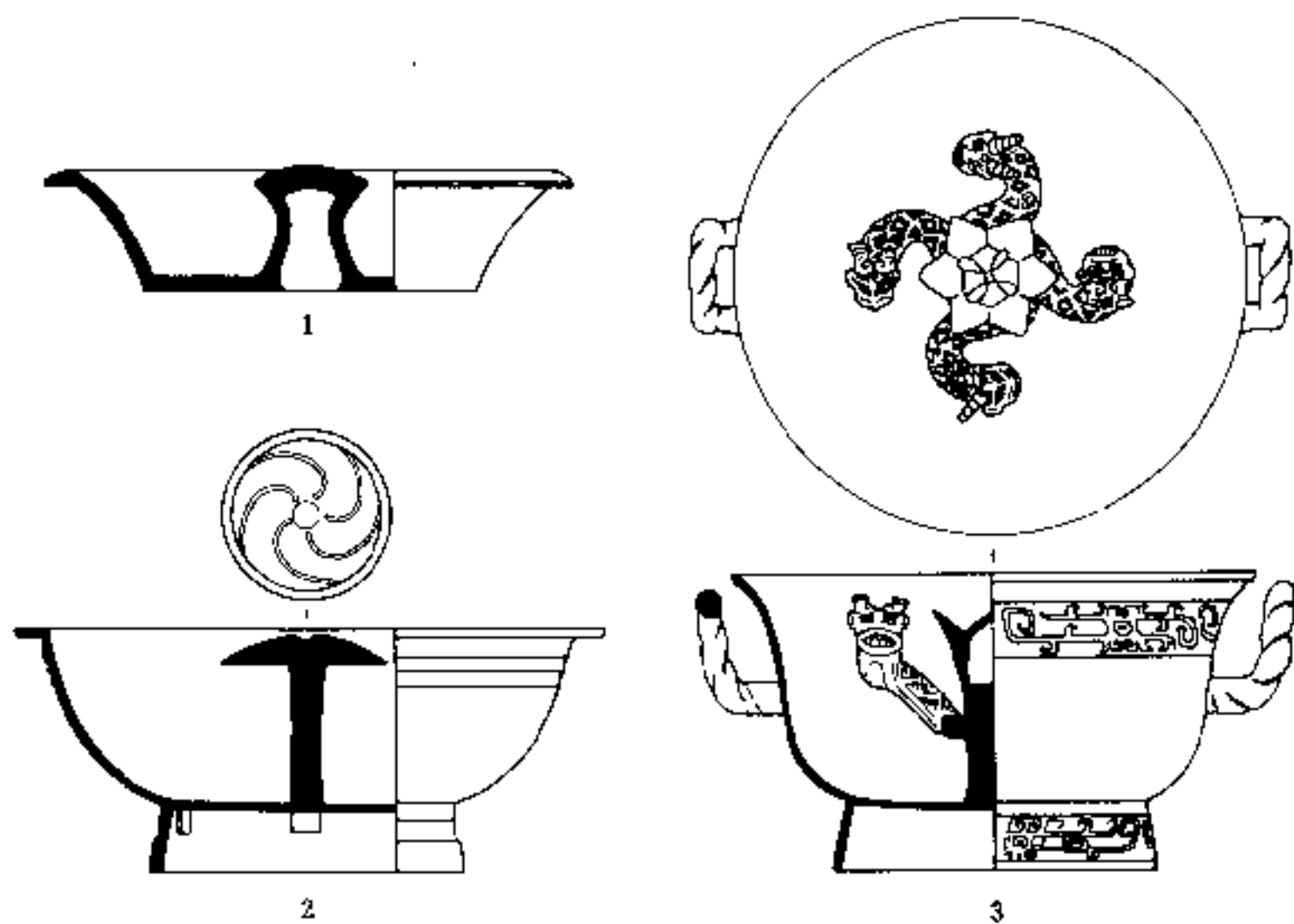
我国古代所说的烛，是将火炬、灯火、蜡烛等都包括在内的。《礼记·曲礼》“烛不见跋”，唐·孔颖达疏：“古者未有蠟烛，唯呼火炬为之也。”用于照明的火炬，早在宁夏海原菜园村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址中已经发现，这里的第13号窑洞之西壁，发现了多处供插松枝用的孔洞，附近的壁土已因火炬的烘烤而变色。此遗址之碳14年代为距今4100—4500年，因知此时室内已知燃“烛”^{①8}。虽然在壁上插松明当烛，烟气既大又不便移动，是相当原始的，但毕竟已经出现了照明的设施。过去曾认为真正的灯要到战国时才有，但这比海原之烛晚了两千多年，时间差距太大。实际上不晚于早商时期我国已创制出点燃油脂的灯具。点油脂和燃松明不同：第一，它须有盛油脂的容器；第二，须有支承灯炷、使灯火不至延烧及油面的装置。我国在唐代以前，灯炷都是直立在灯盏当中的。山东沂南北寨村、河南邓县长冢店等地之汉画像石及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所出漆屏风上刻画的灯，都在灯盏中心升起火焰，即这类灯点燃时的写照^{①9}（图四）。充当灯炷的材料有硬有软，硬的如用剥去麻皮的麻秸之类，软的则可用各类纤维充当。古代将灯炷也称为烛，麻秸作炷的灯即《淮南子·说林训》所称“麿烛”；软材料作炷的灯即该书所称“膏烛”^{②0}。如采用后一种，须在盛油的容器内突起一

柱状小台，将软灯炷搭在上面，方可点燃。如采用前一种，则容器内须设支钉，将麻秸等物插在支钉上，才立得住。此支钉即《说文·、部》“𠄎，镫中火主也”之火主，篆文所象之形甚明。早商时期的灯具就是根据这些特征找到的。1975年在郑州东里路黄河医院属于二里岗下层的C 8 M 32号墓内出土了一件陶中柱盃，敞口，平底，底部正中立一柱，柱顶微鼓。通高8.4、口径35.5、柱顶面直径9.5厘米^②（图五：1）。1982年在郑州商城东南角外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了四个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的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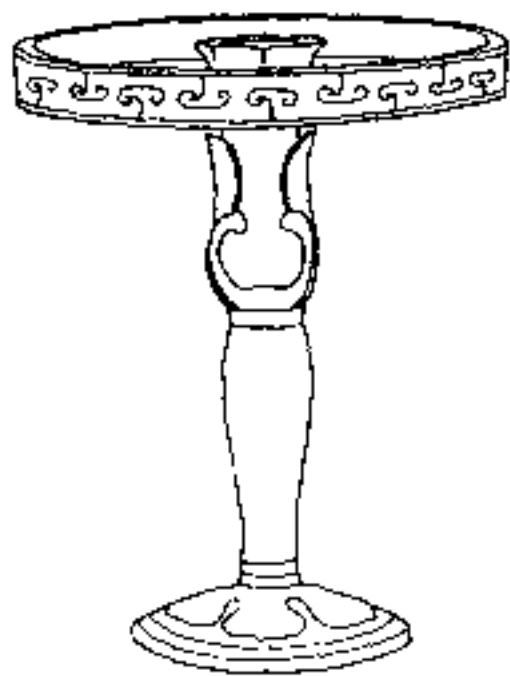
图四 盃中立炷之灯

1. 沂南东汉画像石
2. 大同北魏屏风漆画



图五 商代的中柱盃 1、2. 郑州出土 3. 安阳殷墟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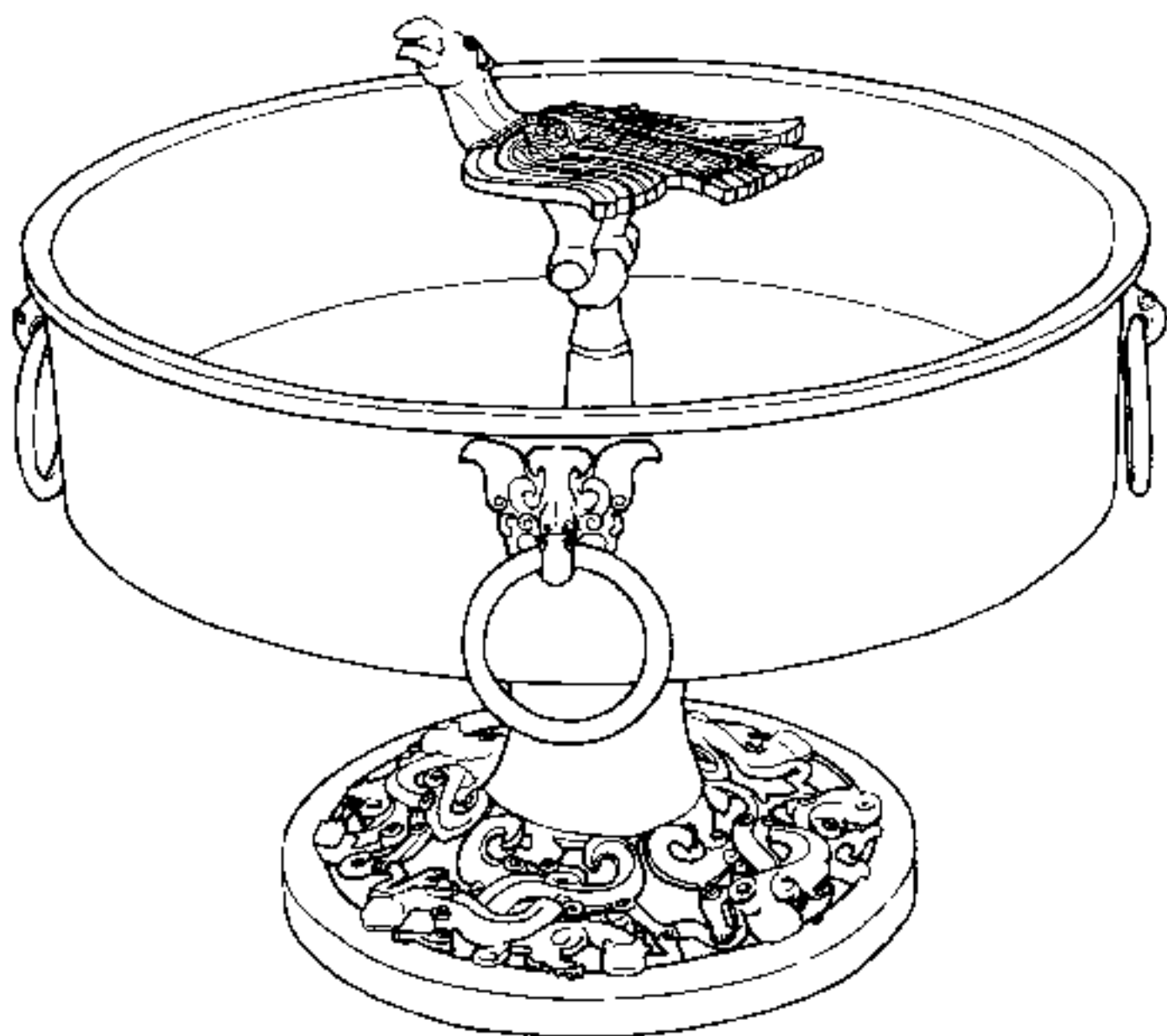
(H 1—H 4)，在灰坑H 1 中出土了一件青铜中柱盂，侈口，鼓腹，圈足。盂底中央突起一细柱，柱顶有饰涡旋纹的伞形帽。通高 12、口径 29.5、中柱高 8、柱顶径 8.2 厘米^②（图五：2）。与此中柱盂同出的青铜器共 13 件，包括大方鼎、大圆鼎、牛首尊、羊首罍、饕餮纹大提梁卣等。在灰坑H 2、H 4 内还发现了不少牛骨。据发掘者判断：“这一地点与祭祀有关”^③。这两件中柱盂的形制完全适合作为搭软灯炷的灯具之用；除此之外，安排其他用途都有难以解释之处。特别是那件铜中柱盂：在上古时代如此典重的器物绝不会是普通日用品，而应是一件礼器，它的出土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从纹饰上看，它和“明烛”或有所关联。因为其伞帽上的涡旋纹即罔纹。罔在《说文》中作罔，并引贾逵说以为罔“读与明同”。那么，将罔纹伞帽上所搭之灯炷点燃，似亦可视为“明烛”。上文已指出，灯炷即烛；有些铜灯在铭文中自名为“烛锭（灯）”，则烛也就是灯^④。“明烛”就是点“明火”的灯。这类灯不仅早商时有，河南安阳出土的晚商器物中也有，30 年代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HPKM 1005 号墓中出土过两件铜中柱旋龙盂，盂内中柱的顶部呈花瓣的小花朵形，中柱周围还绕以蟠龙^⑤（图五：3）。过去曾把它们当作玩赏用的水器，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和早商的中柱盂联系起来看，便不难认出它们也是灯具。特别是旋龙盂之中柱顶端的花朵，更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战国玉灯灯盏中部凸起的花朵状小圆台极相近；它们都应当是承搭软灯炷用的^⑥（图六）。林巳奈夫认为旋龙盂内之顶端呈花朵状的立柱象征《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的“若木”^⑦。而《淮南子·地形训》又认为若木之端有“十日”；因此，点燃起中柱所承之灯火，遂仿佛是若木顶上升起太



图六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玉灯

阳，那么此灯岂不也正是“明烛”吗。只不过至今尚未在商代遗物中发现过凹面镜状的阳燧，不能证明商代是否已知用反射聚焦的方法从太阳光取火，从而也不能确知当时是否已有“明火”与“明烛”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盛油点火的灯。

到了战国时代，问题就更加明朗了。这时除了在郑州二里岗战国墓、信阳楚墓等处继续发现柱顶呈圆形的中柱盂外^②，又新出现了一类鸟柱盘，它显然是由前者发展出来的，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河北平山三汲6号墓等处均出此物^③。平山6号墓是一座中山国国王的墓，所出铜鸟柱盘尤为典型。此盘通高47.5、口径57厘米，盘中立一圆柱，柱顶立一展翅的飞鸟，鸟头昂起，鸟背、鸟尾与双翼位于同一水平，形成一个台面，似是为了承搭灯炷而作的安排。盘外壁有四枚铺首衔环，下为高足，圆形底座铸出镂空的花纹(图七)。其造型上承商中柱盂，下启汉鸟形灯，并与战国时开始使用豆形灯的风气相应。战国以前灯较少见，这时乃以盛羹之豆充当盛油的灯盏。《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晋·郭璞注：“即膏登也。”膏登就是油灯。豆本是日用器，用豆制灯简便易行，故得以迅速推广，成为战国遗址中并不罕见之物。上述鸟柱盘的器身之造型也正和高足豆相近。但在中山王墓里出现一件如此硕大精美的铜灯，绝非日用的豆形灯所能望其项背，那上面的飞鸟只能被认为是阳燧或阳鸟。当盘内盛满油，并将浸透了油的灯炷搭到鸟背上，再用反光的阳燧镜



图七 铜鸟柱盘，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

引下“明火”点亮它；这件鸟柱盘就成为照耀祭品的“明烛”，燃烧着圣火的神灯了。

在我国，自远古之初鸟就和太阳结下了不解之缘。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的仰韶彩陶上有鸟纹和日纹组合在一起的图案（图八）。良渚文化玉器的刻纹中也常出现一个飞鸟，鸟身中部为圆形图案，前有头，后有尾，左右展开双翼（图九：1—5）。牟永抗先生和吴汝祚先生认为这是“一太阳符号，上端作冠冕状图形，两侧有翅膀，是神化了的太阳。”^⑩他们认为鸟身中部的圆形代表太阳，是很中肯的见解。河南南阳英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与四川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上，都在阳鸟或人首鸟身的羲和像中部刻划出代表太阳的圆形^⑪（图一〇：1、2）。汉画像砖、



图八 仰韶文化彩陶图案，
华县泉护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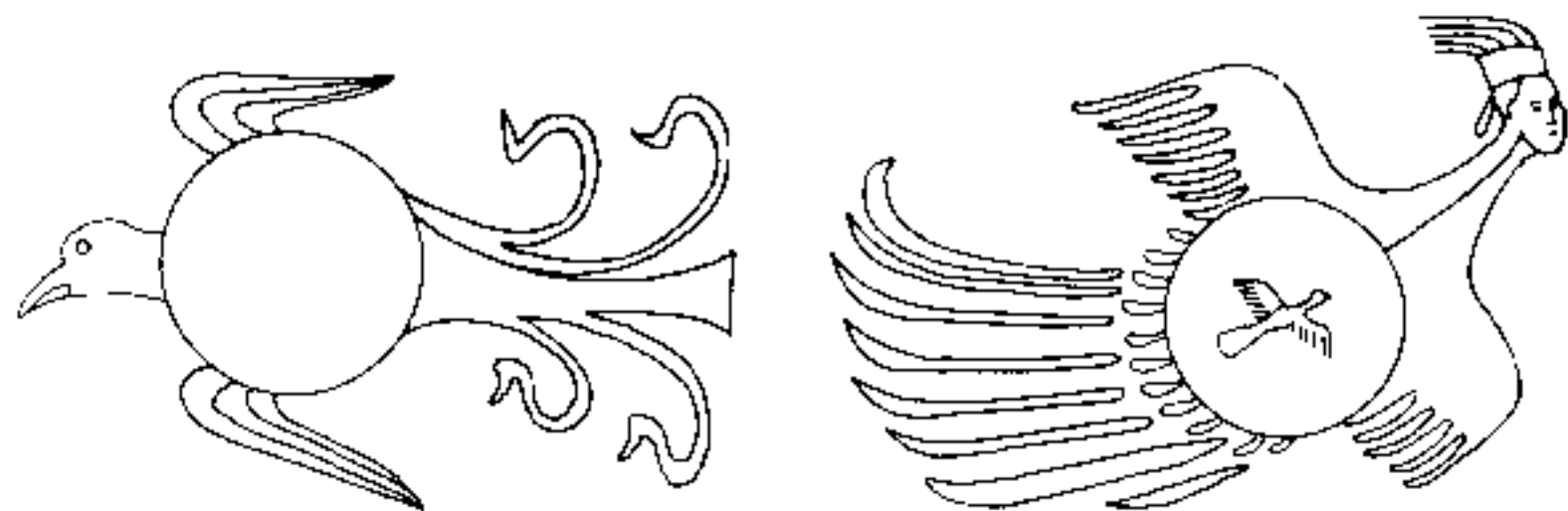
石虽与良渚文化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但《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却是世代相传的神话。所以这些图案应演嬗自同一母题，表现的都是载日的飞鸟。俯视战国鸟柱盘

上的鸟，其轮廓正与上述良渚玉器上的鸟纹（或称太阳纹）相似，当非偶然巧合。在庄严的祭礼中，在神鸟背上燃起炎炎明火，使关于太阳的神话传说在众目之前显现，这比用网纹伞帽或所谓若木来承托这团火焰，不仅更形象化，还会使在场的与祭者深深地感受到神圣而神秘的艺术魅力。

自先秦至唐代，我国自太阳光取明火点明烛用于祭祀的作法，其历时之悠久，用具之华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圣火



图九 良渚文化玉器刻纹 1. 余杭安溪出土玉璧 2. 台北故宫藏玉璧
3. 弗利尔美术馆藏玉璧 4. 首都博物馆藏玉琮 5. 法·吉斯拉藏玉琮



图一〇 汉画像石上所见之阳鸟(左)与羲和(右)

(Sacred flames)的崇拜曾在古代世界的广大地区中流行。就亚洲而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祆教，不仅崇拜火同时也崇拜太阳，其主神阿胡拉·玛兹达的形象就居于日轮之中。突厥人也事火。王小甫《“弓月”名义考》认为：突厥的弓月城（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名，“来自古突厥语kün（日，太阳）和ört（火，火焰）组成的一个合成词，其意为‘日火’或‘太阳之火’，表达了当时已传入突厥的祆教信仰。”^②但突厥人的“日火”或系采自某些宗教圣山上的自燃之火。他们是否使用阳燧，至今尚不清楚。在地中海地区，一般认为阳燧形反光镜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普卢塔克（Plutarch，约46—119年以后）发明的，远较我国为迟。至于世所习知之奥运圣火，古代曾使用玻璃透镜将阳光聚焦；反射聚焦的方式要到1928年的第九届奥运会上才采用，则是本世纪初叶的事情了。

① 据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本，页101；中华书局，1990年。

② 《艺文类聚》卷八〇“火部”引《淮南子》高诱注作：“阳燧，金也。取金盂无缘者，执日高三四丈时，以向，持燥艾承之寸余，有顷焦之，吹之则然，得火。”语意较详。

③ 燧字除作遂外，亦作隧、燧。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〇说：“案：遂，《考工记·攻金之工》经注及《葦氏》注并作‘燧’。《兔氏》注文作‘隧’，《内则》亦作‘燧’。燧（见《说文》）正字，遂、隧并假借字。……燧则隧之俗，隧为烽火，与阳燧义别也。”然今通用燧字。

④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三引。

⑤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 ⑤ 边江、杨林《三千年前中华先人取火于日有了明证》，《光明日报》1995年10月13日2版。
- 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图版38；科学出版社，1959年。
- ⑧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上册，页175—177；文物出版社，1993年。
- ⑩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下册，图版42；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⑪ 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藏虺龙纹阳燧的曲率半径为22.12厘米，同馆所藏蟠螭纹阳燧的曲率半径为7.26厘米，见梅原末治《中国殷周の古鏡》，《史林》42卷4号，1959年。扶风黄堆出土阳燧的曲率半径为20.75厘米，参看注⑥所揭文。侯马出土阳燧范之凹面的曲率半径为7.6厘米。
- ⑫ 程长新《北京市拣选古代青铜器续志》，《文物》1984年第12期。
- ⑬ 《汉金文录》卷五所录汉代铜尊铭文为“大吉，宜用，富贵阳遂。”《鄂城三国六朝铜镜》图110所录黄武六年镜的铭文中“宜子孙，阳遂富贵老寿”等语。湖南衡阳茶山坳27号三国墓所出墓砖上有“阳遂富贵”铭文，见《考古》1986年第12期。此吉语亦见华非编《中国古代瓦当》图195、196所录瓦文。
- ⑭ 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墓》，《文物》1983年第5期。
- 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朝鲜画报社《德兴里高句丽壁画古坟》图版38；讲谈社，1986年。
- ⑯ 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
- ⑰ 洛阳博物馆《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